

偶然·上海

顾文艳

本书中收入的所有文章都是在我上海写下的。写作时间散落在2016年至2023年，不长不短，正好是我在上海生活的七年。

第一辑的主题是现代性，收入的学术书评、论文主要关注中国在与西方碰撞的遭遇下，文学、思想与文化现代性的多重景观；第二辑收入两篇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文章，其实是第一辑的延续，延续的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如何进入世界现代性的焦虑——这种焦虑至今依然在我们的时代精神里飘忽、蔓延；第三辑收入三篇当代中国作家作品的评论，第四辑收入一系列随笔体的文艺短评，对象是当代西方文学、影视与艺术作品。

写什么，写谁，怎么写，这些问题在提笔的时候都很轻巧，似有若无，最终成书也很偶然。我决定选用第一篇文章的标题，去掉引号，当书名：偶然的诗学。

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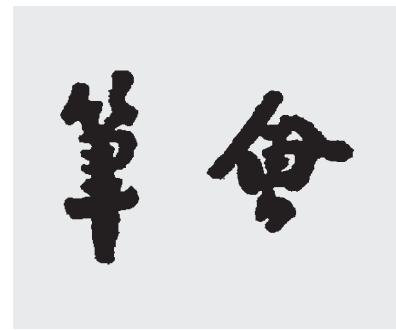
我其实不相信偶然。

我这几年更喜欢用的词是机制。在历史的进程中，我从不太相信人的主体性。黑格尔看到世界精神骑着马迎面而来，我看到的可能是悬在马背上的蜘蛛网，缚住日出日落的世界机制。文学场也一样，是个大蛛网。每个人的写作、行动都不是偶然，都在精神追逐和名利驱动的逻辑框架里有有条不紊地运行。只是文学本身预设了更多主体性，所以我们总期待一些奇迹般的、偶然的瞬间，能重新划亮生活与生命。

这本书第一篇写的还是王德威2017年编的《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》。看完王德威的序言，我就确定“偶然”是个重大线索，或者用更学理的话说，这本文学史聚焦的是一个由“偶然”掌舵的现代中国的历史时空。2016年刚开始读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的时候，我很喜欢他在《被压抑的现代性》里面说，文学史应该在“历史偶然的脉络中”想象“隐而未发的走向”。文学史不一定非要写作品和人事，还可以问一系列假如，一系列终于在这部文学史里展开的假如：

“假如鲁迅没有在1918年晚春的街头遇见钱玄同，假如张爱玲没有离开上海去到1941年日军占领下的香港，假如老舍在1953年选择留在美国，他们代表的中国文学‘现代性’——那些归根结底基于个人生命体验的文学创作及其历史意义——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填补或空置？”

这可能是我写的这些论文里自己最喜欢的一段小排比。人是可以被替代的。人的功名成就就是可以被空置的。人的境遇是偶然的，也因此可以被



2023年12月17日 星期日

（文艺评论集《偶然的诗学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·世纪文景即将出版）

祖坟山记

严辉文

一大早，我们把车停在佩尔热力公司的路边。

未伏的清晨，仍然没有一丝风。刚出的太阳迅速统领一切，阳逻开发区的厂区楼宇因此显得一派蒸腾嘈杂，不像刚醒来的样子。抬头即可望见坟山，那是从前老家王家湾往北一带的一个小山坡。

“坟山应该离九房中学不远。”我说。

弟弟往南边那个做棉被的厂区方向一指，说，“九房中学在那里，变成了工厂的地基，祖坟山这里是以前我们红岗大队畜牧场的位置”。

这样说起来，我脑子里开始涌现一些构图，并且将从前的王家湾、竹林湾、魏家湾、红岗小学、九房中学、塘角湾、九房湾、伞楼村一一安放，将那些柴泊湖边弯弯绕绕的村湾、树林、水塘、山坡和田畈，叠加到眼前的厂房、高楼、大道、汽车和轻轨线上。脑袋里不免出现两个世界交织，仿佛两个世界都在同等用力拉扯着我，又仿佛时间和空间经过脑袋和眼睛，飞速换片。

到达祖坟山已不容易。必须假道佩尔热力公司。

从上坟祭祀的意义上讲，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。所以佩尔公司人对我们上坟人还算关照。佩尔大门一直敞开，默许我们借道往里走，大约50米，又是一道紧闭的铁门，一摇动门闩，几条狼狗就启动了狂吠机制。一阵心惊胆颤之后，我们依然坚定往里朝着祖坟山行进。因为我们已经知道，好心的佩尔人早已将狼狗们锁进了笼子。

我们议论了一下狼狗，猜测人家养狗的缘故。结论是靠坟山太近，多半是晚上值班人需要吠声陪伴壮胆。

祖坟山就在眼前。上山几乎没有路，那条小路是被我们这样的上坟人踩出来的。临近山脚有一段路低低的，总被一股神秘的沁水浸着，泥巴兮兮的，我们只好像之前路过的人一样，尽量踩着旁边牛筋草小心通过。地面上情形如此，头上、身上也并不轻松，野生构树、荆条正是长牙舞爪的季节，不管这是不是路，兀自野蛮狂欢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牵着掰着那些枝条，还是难免要接受勾扯扭着。

山坡上野蒿子密密匝匝，踊跃奋迅，高过人头。狗尾巴草亦非等闲之士，一丛丛高扬起狼狗一样结实的尾巴。在各种草树之间，这两种植物最显眼，它们不顾草本身出身限制，似乎偏要与野树争高，事实上，它们已至少在身高上显示了优势。我们在植物中间浩浩，脚下的阻力不比从前在柴泊湖浩水小，而且时有隐患。倒不是担心蛇，我们都换上了上坟山的运动鞋。最担心的是刺。不时遇到丛生的刺树，叶片青绿，好看的叶子间，隐藏着黑硬的尖刺。这种尖刺格外牵挂衣襟、手脚，一不小心挨上了，就扎得人刺痛。我们路过时，只要看到，总是小心翼翼地把

它从草莽中挑起来，免得不小心被刺中。这种树最顽强。记得有一年清明节，我们上坟路上被这种密集的刺树阻挠，人多年未从事农业劳动，手头又无工具，只好花200元就近请人铲除。那人且挖且铲，乃至于用火攻，当时看起来后患已除的样子。未料不久后的七月半，我们再上坟，发现那些刺树和野草们照样蓬勃，仿佛未曾遇上过任何挫折和敌手。

我想起来从前我们旁边的魏家湾后面，曾有一片古老的刺树林。树干弯曲光滑，树上的刺都有手指那么大，几根刺集成一丛，如手掌，如虎爪，如矛如剑，无比坚硬，让人畏之如蛇蝎。有些不懂事的熊孩子，会把那些刺埋在路上，人畜中招，痛不可忍，不啻为一种酷刑。那些刺树令人叹为观止，之后在其他地方再也没有见过。不知魏家湾一带在远古的年代是不是一个独特的天然森林。我想，现在这坟堆里倔强摇曳的小刺树，也许是那片古老刺树林的嫡传子孙吧。

这些草树，无拘无束，放肆伸展，高大茂密，自得其乐，引得小时候早早辍学干农活的大妹妹感慨不已：“这要是从前王家湾，谁遇上了就是捡到宝了。”

于是大家纷纷提及从前炊架（找柴火）的旧事。农村最大的事情，都是由灶火决定的。锅里要有煮的，灶里要有烧的。那些以灶火为中心和生活追求的日子，灶里烧的柴草以及锅里煮的粮食，永远是同样面临短缺。以至于，所谓的炊架，到了最后基本无柴可砍，演变成了过路不生草式的公地悲剧。田埂上的野草，山边的茅草，地里的杂草，山坡的草皮，都被人们抢着收入灶下。

“有一年，什么草都找不到了，高头睡着的那人，跳到柴泊湖捞水草，湿淋淋的菱角藤、水蓼、茨实秆、荷叶，晒晒了一个热天还不是一样烧？”小妹妹总结道。虽然母亲前不久也安葬到了这片坟地，但我们知道，在我们的叙事中，高头睡着的那人，主要是指父亲。父亲是一位忍者，耐力极强，像他驱使过的那些水牛一样，一生经受了无数艰难的农耕日子的考验。他老人家的人生路径艰辛短促，仿佛是日子稍稍好过了，拆迁进了城之后，习惯不了，就一头躺到了这坟地里，躺到了他自己的父母身边，没有享过什么人间福分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一个人又生活了近十年。用折寿、黑茶、药酒、活着的美好愿望、子孙团聚的欢娱与孤独、心脏病及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博弈，屡败屡战，悲欢交集，最后两个月，在我们兄妹四人的轮流照料下，赢得了最后的安详、平静和尊严。

逝者如斯，世事变化太快，山上躺着的人们跟我们一样，都未曾预料。比如，这些活过的人或者仍活着的人，同样都未曾预料，山上草树，终有一天会因无人问津而蓬勃茁壮，或者会因蓬勃茁壮而无人问津。无独有偶，春天的时

候，我们阳逻小城对街上千篇一律的樟树进行截枝，园林工人截树后，满大街树枝成灾，环卫工人处置起来十分困难，我亲眼见过他们一边清扫拖拽，一边叹气连连，怨这些树怎么长得这么多事。我同样想过，这基本算是好的柴料，要是从前在王家湾，哪还有落地的？现在竟然成了灾。我甚至设想，有没有一种技术，把无人问津的柴草收纳转运深埋处置，比如填入那些早已空洞无物的矿洞，假以亿年，会不会再次变成煤炭变成宝呢？我又知道这同样是浩大的工程，会因眼前看不见的利益计较显得得不偿失而成为奢望，成为我一个人的闲人式思想。唉，这世上的事情何以总是这样，一边是艰难拥有，一边又只能接受它们被白白浪费。真真此事古难全也。

我们拎着纸、香等，来到了位于山坡最高处的祖坟边。今天是给母亲烧七七的日子。母亲去世后，我们依旧沿一带的旧俗，学着烧七。跟很多民俗祭祀活动一样，其功能与意旨，很难用科学明白的话语解释清楚，需要的永远是学会虔诚和行动。哪怕一站到山头，就浑身汗湿，哪怕我们架好的纸一点燃，就会熏得人泪流不止，我们仍然相信，逢七上坟，直到满七四十九天，母亲的灵魂终会飞升天堂。而母亲的骨灰盒又代表她自己，魂归故里，躺在这片山坡上，被“邻居”接纳和善待。

是的，这个祖坟山不是公墓。它之所以被允许存在，完全是因为从前在山头架设的高压线，现在暂时没有迁移或架设的可能。我甚至记得小时候见到工人架设电线塔的情形。那是我首次见到这么多的铁，这么多高耸的铁。这样一条高压走廊的存在，使寸土寸金的阳逻开发区，在拆除了王家湾、竹林湾、魏家湾、红岗小学、九房中学、塘角湾、九房湾、伞楼村等之后，在挖掘机、圈地运动、招商建设密密重重的扫荡梳理之下，仍然允许存放这样一个小山坡。于是，这面小山坡，在阳逻开发区众多的工业园区、高楼住宅区、酒店、写字楼的环境下，像一个原始的切片，荒芜而挺立，供我们怀想从前故乡的模样，或者帮我们确认，故乡确实是存在过的事物。帮我们储存一小片故乡。在柴泊湖边香炉山、晒雨山等群山消失之后，仿佛也是为了提示越来越多的外来者和后来人，从前柴泊湖真是有山的湖。

我们烧纸的时候，大妹妹常常会念叨有声。“妈，我们烧了许多钱，您到了那边，不要太节约了，该花的花，该打点的打点。”

“爸，妈来陪您了，您也不愁钱花，可以喝点小酒了。”

当然也没有忘记给旁边的祖父祖母坟上烧纸。弟弟指着旁边的坟堆介绍，“这是先锋叔叔家的坟，那是中明叔叔家的坟，再往前，是程家的几座坟”。

小妹妹说，“都是从前王家湾的老

邻居，妈，不寂寞了，可以跟着戴家婆婆一起学着打麻将了”。

我顺着弟弟的介绍看过去，这个高压走廊下的小山坡，在荒草杂树间，林林总总立着许多墓碑。稍近能看到，碑上刻着曾经熟悉的名字。坟堆甚至也像从前王家湾一样，大致排成两排，旁边还有从前竹林湾、魏家湾、九房湾一些人家的祖坟。冥冥之中，祖坟山上重现了一座地下的村落。

王家湾拆迁20多年了，跟旁边的竹林湾、魏家湾、九房湾、伞楼村一样，迁入了阳逻街上阳逻大桥引桥旁边的万人村。本来当初老人们入土为安，可以像阳逻镇上的人一样，还有其他的选项，村干部们也做工作说，更好的安排就是进入公墓。但是大多数乡亲还是选择了，丧葬之时，由从前湾的男劳力组成八角，火化后，慎重其事，嗨嗨呀呀，抬上这面古旧山坡。

许多老人临终前，都明白说出了这样的遗愿。现在面对这个地下的村庄，我仿佛明白了老人的故事和诉求。这个祖坟山，算是重建还是固守？是眷恋还是终结？我们眼下还无法下结论。想起了老人家常说的白喜事，百年身故，有一片类似故乡故土的地方，作为最后的归宿，也许算得上是无意义人生的一大意义？

这个祖坟山也因此成了老家拆迁后故人聚首的地方。除了烧七这种个体行为外，年后后上坟、清明节上坟、七月半上坟，几乎是孝子贤孙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动。因此，我们在祖坟山上，经常会遇上老家人。大家上山祭扫的时候，通常是沉默寡言的，顶多只是行注目礼。各自在自家的祖坟前行礼如仪毕，尤其是下山的路上，才会出现老友相逢故人相聚的场面。我弟弟、望平、强新、永明叔叔，这些都是热闹人，散烟叙旧之后，半老不少的孝子孝孙们，再次还原成了乡镇干部、乡村教师、银行职员、小店主、失地进城农民和曾经的小镇做题家，甚至还还原成了从前的王家湾、竹林湾、魏家湾、红岗小学、九房中学、塘角湾、九房湾、伞楼村的著名淘气鬼辉武、望平、强新、永明等等。直到寒暄得差不多了，烟也抽得差不多了，才记起把自己身边新潮而沉默的子孙相互介绍。一边催促他们喊叔叔伯伯，一边在这些沉默的新人类面前解释，这些仔不爱叫人，不爱打招呼。寒暄交换出来的信息显示，这个祖坟山根脉上发出来的后人，不只是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，其足迹甚至有遍及全球之势。

回到烧七。我们兄妹烧完了纸，已是满头大汗，又依次在坟头给祖父母、父母叩头，抬头向祖坟山上的那些墓碑致敬，然后眺望新一天开始轰隆隆的阳逻开发区。下山时，那些杂树草丛，又伸出枝条羁绊我们。弟弟想起什么似的说，“下次上山的时候，无论如何要把把镰刀上来”。

2024年8月

一直不敢触碰那个电话——十年前试着拨那个电话，竟是蒋老师女儿接的，说她爸爸患脑卒中，她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。这些年多方打听蒋老师的消息，均无果，最近从蒋老师的同学处得知，他已离世三年多了。

我重又把蒋老师送我的画册找出来。这本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蒋连碁画集》，这么多年来我竟没有翻过。我懂得艺术家的寂寞了，不止生前，也包括身后。蒋老师生前在江苏、山东搞画展，也给我发来邀请函，我看不懂，加之我在岗位上，请不了假，只好婉谢，但我懂得蒋老师那寂寞的心情。我最近出版了一本诗文集，送给一些朋友，可能有些朋友在我死后也不会翻看，我同样感到寂寞。

我和画家蒋连碁怎么认识的呢？记得在淮北的那所学校，操场上白雪茫茫，一位同事说：“画家。我看到操场那边，走过来两个人，其中一个穿风衣的高大男子，同事说：“他就是画家蒋连碁，刚刚在中国美术馆搞过画展回来。”——在中国美术馆搞画展？那一定是大画家了。

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是朔里中学，有一天同事陆老师对我说：“抽时间我给你跟蒋连碁认识。”他和蒋连碁是从前的同事。他带着我去见蒋连碁，蒋老师就住在我们校园内。我发现蒋老师并不是那么热情，因为找他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多数有个目的，就是索画。蒋老师的画稿都贴在墙上，天天对着画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忆蒋连碁老师

李新

稿看，不满意处随时随地修改。陆老师从墙上抢下两幅，被蒋老师夺下来，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绝对不行。”陆老师觉得不好意思，也不勉强。我也觉得陆老师太心急了些，那只是画稿，不是成熟的作品，再说没钤印，没盖章，就不能说是蒋连碁的作品。

我和蒋连碁老师的交往是因为文学——他跟我谈绘画，等于对牛弹琴。他跟我谈诗，谈散文。我因为写他的专访，对他的身世有所了解。他出身贫寒，小时讨过饭，后来考进齐鲁师范。在师范学习期间，他爱上了绘画，师从画家郑正老师。天寒地冻，他在寒冷的房间里，反复训练艺体描摹，这为他以后的绘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书法上，他研习汉《石门颂》，苦练张旭、怀素狂草，隶结合，书法自成一格。他爱好诗词，古典文学底子深厚，他的很多绘画作品都是自题诗，以绝句为多，诗风豪放潇洒；他爱好楹联创作，写成书法作品，“酸甜苦辣人间事，浓淡干湿笔中情”是对他人生及艺术的集中概括。

我和他同住校园内，其实见面是很少的。他一年之内至少有半年是在外面跑。他的工资全用在路上了。他爱人王老师是他师范时的同学，小学老师，工资不高，养一儿一女，还要接济蒋老师家里，操持这个家确实不容易。有一次蒋老师的一位朋友到他家吃饭，我也在场，那位朋友说：“你成名了，首先要感谢的是嫂子，没有嫂子的支持，就没有你的今天，来，我敬嫂子一杯。”蒋老师没做任何表态。有一年春节，学

校门口有人下棋，蒋老师也过来观棋，我问他：“年货准备怎么样啦？”他说：“喝刷锅水我也不问。”那个时候我没读过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，蒋老师是不是那个思特里克兰德？

为了追求他心中的艺术，他跑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，在镜泊湖，他在船上借宿一晚；在黄山，他住就是半个多月，观察黄山的奇松怪石、险峰危崖、云海云岚；在九华山，和庙里的和尚住在一起。我虽然不懂画，但能感觉到蒋老师的山水画有股勃勃之气喷薄而出。刘懿说：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。”蒋老师胸中是有万千丘壑的，不然画不出那种大气夺人的作品。他属牛，画过《蛮牛图》，身上有股蛮牛劲。

他说：“在艺术的道路上走一千里，就把碑立在一万里处，跑不到终点，累也要累死在途中，徘徊观望，都是没有出息的。”我见过他作画，画好后再泼点水，左折一下，右折一下，上折一下，下折一下，再对折，效果特别好。他有一次观察雨中荷花，回家用水洗法表现，那种雨莲朦胧之美，妙不可言。蒋老师的生活规律是这样的，在家里，提个酒瓶子咕嘟咕嘟喝了一通酒，然后在长案上提笔作画，三抹两抹，一挥而就，贴在墙上，看哪里不满意，再摘下来，再添一笔，那描一笔，他说：“作画关键在收拾，画完一幅画很容易，但要成为作品，往住要收拾几个月。”

蒋老师似乎始终处在艺术状态中，他作画累了，跑到我单身宿舍里，坐一会儿，说：“小李，我带你去看电影。”那

就去，到相山影院，把门的说：“连碁给我画一幅画呗。”他哪里理睬，径直往里走，看了两眼电影，也不知啥名字，说：“小李走。”又到一唱豫剧的老朋友家，也不坐，也不喝茶，寒暄两句，说：“告辞了。”我们又回到校园内，真有点“雪夜访戴”的味道。转了这么一圈，他大概有灵感了，又回去画他的画了。

且生活中无处不可入画。他有一幅画是两头牛角相触，磨来磨去，就是不斗，题写：“一日，观两老实君吵架，光吵不打，遂画。”是两位老师吵架，于是他起了灵感，画下了这幅画。

他到上海大学做教授，又调到了深圳，我以为我们见面难了，哪知我也离开家乡调到了上海。我们家的电话铃响了，我一拿起电话，是他，他说：“我住在国际饭店，有时间过来玩。”我在光明中学上班，离国际饭店近，下过课我就去看他。他住的是总统套间，有个大画案，写了很多幅字，一幅幅画摊在地上，牡丹以富贵的姿态鲜艳夺目地开着。门框上挂的一幅，我说：“这幅小品不错。”我不懂画，那种大笔意大泼墨的画我欣赏不来，觉得小品疏朗，有意境。他说：“喜欢吗？喜欢你拿去。”我与蒋老师交往多年，从未张口求画，这次他主动送我，我很感动。他把这幅画摘下来，钤上印。这幅题为“蕉荫”的画，画了几片芭蕉叶，三只小鸡在荫下乘凉，覬覦一只小虫，灵趣可爱。画是画在毛边纸上的。这是我珍藏的蒋老师的唯一一幅画。这幅画他送我时，说本来是给安徽省博



物馆的。他随后又画了一幅，五分钟完成，可能后面就是“收拾”了。

蒋老师说：“除了地位不高，我什么都高。”五十多岁，他血压、血糖、尿酸均高。在国际饭店吃饭，蒋老师问服务员：“有没有红芋干子稀饭？”服务员摇头，说：“没有。”走遍世界各地，尝遍山珍海味的蒋老师，最怀念的是家乡的味道，妈妈的的味道，他自称“布衣蒋连碁”，名扬中外的画家，始终改不了的是布衣本色啊！可他身不由己，再布衣也是名人，饮食上没法节制，又未戒酒，导致他未到退休，脑卒中找上门了。

蒋老师的艺术生命终止于他六十岁之前——由于中风，他握不住画笔，这便宣判了他艺术的死刑，这对于一个视绘画胜过生命的大画家来说，是多么残酷的现实啊！我不知道这十多年蒋老师是怎么过来的，他一定很孤独吧？他的绘画，被人民大会堂以及各地博物馆收藏，除了国内的各大美术馆、博物馆，还在巴黎大皇宫举办了个人画展，获“法国美术家协会”奖……可这些，都在他六十岁生命到来之前戛然而止。

弦断有谁听？